

伟人毛泽东丛书

政治战略家毛泽东

Wei Ren Mao Ze Dong—Zheng Zhi Zhan Lue Jia Mao Ze Dong

邓力群/主编

(一)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ZHONG YANG MIN ZU DA XUE CHU BAN 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战略家毛泽东 / 邓力群主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3.5
(伟人毛泽东丛书)
ISBN 7-81056-768-3

I . 政… II . 邓… III . 毛泽东思想—政治理论—研究
IV . A84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0244 号

书 名：伟人毛泽东丛书
主 编：邓力群
出版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发行部) 68472815 68933837 传真：68472751
电话：(总编室) 68932218 传真：68932447
印刷者：北京仰山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者：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980 (毫米) 1/16
印 张：748.5
字 数：1262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
书 号：ISBN 7-81056-768-3/A·10
定 价：3590.00 元 (珍藏本 全 24 册)

总 目

- 毛泽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沙健孙(1)
- 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理论 张启华(391)
- 毛泽东国家学说 刘德厚(565)
- 毛泽东与党的建设 罗小凡(837)
- 毛泽东政治战略理论与实践 唐春元(1059)

毛泽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沙健孙 著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人民革命的新阶段	(5)
一、中国人民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5)
二、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13)
三、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	(19)
四、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	(28)
第二章 毛泽东与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革命理论	(40)
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	(40)
二、毛泽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44)
三、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49)
四、毛泽东思想成为党领导人民团结战斗的旗帜	(62)
五、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65)
第三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78)
一、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	(78)
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	(81)
三、革命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86)
四、革命的参加者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95)
五、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107)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122)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	(129)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129)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143)
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172)

第五章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88)
一、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188)
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203)
三、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220)
四、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232)
第六章 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238)
一、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38)
二、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	(247)
三、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	(251)
四、特定条件下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	(271)
第七章 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	(284)
一、在斗争中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284)
二、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290)
三、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298)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纪律	(318)
五、正确认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	(329)
第八章 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344)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	(344)
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352)
三、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性选择	(359)
四、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372)

第一章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一、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度。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以来，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的斗争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几乎没有间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的斗争由于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其规模之宏大，群众动员之广泛，社会变革之深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而且会发生这么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呢？

1949年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为发表美国国务院关于美中关系的白皮书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件中，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说明。

其一，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按照这个说法，中国是由于人口多了，饭少了，所以才发生革命的。

从现象上看，事情似乎是这样。中国人民由于被推到了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上，才被迫奋起抗争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把他们推向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上的呢？是人口过剩吗？不是。我们知道，人口规律是社会规律，不同的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旧中国确实存在着人口过剩的问题。只是这种人口过剩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种相对的人口过剩，是由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反动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为什么在国民党统治区，

广大人民陷入了饥饿的境地,这里的社会秩序动荡,群众反抗现存政权的斗争不断发生;而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够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那里的社会秩序稳定,人民与政府亲密无间呢?为什么在旧中国,只有四亿多人口,就发生了“人多了,饭少了”的问题,以致人民不得不起来造反;而到了新中国,人口逐年增长,今天比解放前夕几乎增长了2—3倍,群众性的温饱反倒获得解决,广大人民反倒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呢?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艾奇逊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其二,艾奇逊说:“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在这里,艾奇逊把事情的因果关系从根本上弄颠倒了。事实上,“不是什么西方思想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①。中国人民正是由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感到了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陷入了饥寒交迫和不自由的境地,才“骚动和不安起来”,才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去寻找救国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的。这些西方思想的传入,在一个时期内确曾对中国人民起过某种启蒙的作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思想旗帜的。“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它们并不能帮助中国人民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很快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并不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旗帜下,恰恰相反,是在否定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之后,才具有波澜壮阔的伟大声势,走上胜利发展的康庄大道的。

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之后,这个革命在国内的主要对手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首脑蒋介石写过一本题为《苏俄在中国》的书,总结自己在大陆上反共失败的教训。在这本书中,他把中国社会发生革命变革的原因归结为苏联在中国的“阴谋”。他说:“苏俄诱惑群众的宣传,就是使他们误信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为达其乌托邦之惟一捷径”。“本党和政府虽看透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并“确立坚决的反共政策,因其得不到国内民众的了解与国际友邦的支持,乃不得不中途挫折,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13页。以下引用《毛泽东选集》的文字,均不再注明该书的版本。

而终于失败”。

在这里,蒋介石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讲了一篇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在长时间里,国民党统治集团掌握着全国政权,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且占据着几乎所有的舆论工具。它不遗余力地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并且对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接受共产党的宣传、跟共产党走的人采取极其严厉的镇压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仍然“得不到国内民众的了解”,而他们竟然不惜冒牺牲生命的危险,勇敢地集合到共产党的斗争旗帜下来?这难道是“苏俄的阴谋”这几个字就能解释得了的吗?更何况,我们知道,蒋介石本人正是玩弄阴谋权术的能手,他在与自己政敌的斗争中,从来都是胜利者;只有同共产党的斗争属于例外。

诚然,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中国革命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赢得胜利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并不是由于苏俄作“诱惑群众的宣传”,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②

总之,无论是艾奇逊还是蒋介石,作为中国人民革命的敌对力量,他们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对中国人民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出切合实际的说明。

列宁指出,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③事实上,近代中国社会充满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包含着极其严重的危机,孕育着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伟大的中国革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④为了具体地了解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最基本的事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14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515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4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633页。

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其一，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二，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为什么说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呢？

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向中国举行多次侵略战争（如 1840 年的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57 年的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1884 年的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 年的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1900 年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并采取种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一方面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殖民地化了，而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形式上仍然维持着独立国的地位。

下面我们就来比较具体地说明这种情况。

首先，中国已经没有完整的主权，在政治上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其表现是：

资本主义列强强迫占领或“租借”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如：英国强占了香港。俄国割去了中国大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吞并了中国西境巴尔喀什湖、斋桑泊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围共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强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德国“租借”了胶州湾。俄国“租借”了旅顺、大连。法国“租借”了广州湾。英国“租借”了威海卫、“新界”。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中国的若干中心城市设立“租界”。这种“租界”是十足的殖民地，这里的一切都由外国殖民者管理，中国的法律在这里不发生效力，俨然成为“国中之国”。上海外滩公园的门口甚至挂着“中国人和自行车和狗不得入内”这种极度污辱中国人的牌子。

资本主义列强还向中国勒索巨额的“战争赔款”。它们发动侵略战争来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人民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如：鸦片战争后，英国勒索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白银，这笔款项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勒索赔款二亿两白银，清政府还付出三千万两“赎辽费”，这笔款项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它们更勒索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达九亿八千二百万两，当时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要负担二两多。这种行为，乃是外国侵略者对于中国所实

行的公开的掠夺。

资本主义列强还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特权。1900年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滦州等十二处“留兵驻守”。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得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有关权益，在旅顺设置了“关东总督府”，并派兵驻守上述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关东军，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突击队。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中国政府无权处理。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更规定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即所有在华美国人之一切民事、刑事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中国确实已经没有独立的主权可言。

资本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中英南京条约规定，通商口岸的进出口货物，“均宜秉公议定则例”，这就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中英虎门条约中附有海关税则，规定的进出口货物税率都比鸦片战争前降低了50%左右，未列入本税则的进出口货物税率“值百抽五”。中英天津条约更规定，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征税5%；外国商品运销内地，只纳价值2.5%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税率最低的国家。问题还并不止于此。资本主义列强还掌握着中国海关的行政权。总揽全国海关权力的总税务司和设在各海口的税务司都是由外国人充任的。英国人赫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五十年之久。这就是说，中国海关不但不能成为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工具，反而成为外国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重要据点了。

资本主义列强还以实力为后盾，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如：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广东、广西、云南为法国的势力范围，长江中下游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东北为沙俄的势力范围，福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各国在其势力范围以内，拥有筑路、开矿的特权。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列强竞相争夺的一块肥肉。

同时，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控制，中国在经济上逐步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依赖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其表现是：

“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

和财政。”^① 它们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强迫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还通过给予贷款来支持中国的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中国政府举借外债，是以关税、盐税为担保的。这两项税收，是中国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清政府的这两项税收全年约四千至五千万两，主要用于偿付外债，自己只能得到一点“关余”、“盐余”。与此同时，外国银行在中国不只吸收存款，还发行货币，垄断国际汇兑和商业信贷。因此，它们就“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②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现代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由中国自主经营的，1894年为21.1%，1911年为6.7%。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吨位，外轮占主要部分：1897年为76.8%，1916年为77.6%；中国最大的内河长江航线上中外轮船吨位，外轮也占70—80%。远洋航运更几乎全部由外国资本垄断经营。

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因而就可以把中国变成它们自由倾销工业品的市场。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中国直接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以获取高额利润。1913年，外国资本占煤矿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和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并且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布机。它们“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③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主要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使得帝国主义势力无法征服中国，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势力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妥协，使得它们不可能瓜分中国，这样，它们才没有能够如同英国在印度那样，对中国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62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2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29页。

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① 这就是说，原本独立的中国，尽管仍然保留着独立的形式，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真正独立的地位，而变成了半殖民地。

为什么说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呢？

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促使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另一方面，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保持着，并且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的优势，而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则依然控制着政权。

下面我们也来比较具体地说明这种情况。

本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这就是：大量有人身自由但却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的存在，大量货币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创造了这样的前提。

外国资本的倾销，首先导致个体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的衰落。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废为不材，洋铁、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而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之计，皆为所夺矣。”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走向破产。他们成为游民，流入城市，这就是中国产业无产者的后备军。

“由于破坏自然经济的力量主要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小生产破产后的货币财富的积累，主要落到外国资产阶级口袋里去了，因而在乎国，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破产失业者，另一方面并没有相应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者。”不过，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中国的一部分货币财富的持有者终于开始投资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他们成了中国最初的民族资本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原始资本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积累起来的。”与西方国家不同，这些近代工业的投资者主要不是原先的作坊主、工场主，而是原先为外国资本服务的买办、本国的封建官僚或地主，以及商

^① 《毛泽东选集》，第 629 页。

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

在近代中国，虽然“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① 由于受到外国资本的排挤，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反动政府的压迫，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充分的发展。在经营工业获利没有保障而经营土地不仅获利高而且可靠的条件下，许多货币持有者热衷于兼并土地，很少有兴趣投资于工业；就是民族资本家自身对扩大再生产也缺乏热情，不少人将经营工商业获得的利润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土地，而后把土地出租给农民，兼事封建剥削。所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进程极其缓慢。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则依然构成广大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基础。占农村人口不到 10% 的地主，占有 60—70% 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 70% 的贫农连同雇农，却没有或只占有很少量的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并把自己收获物的四成、五成甚至六成、七成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只能形成封建势力占支配地位的上层建筑。在政治上，先是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接着就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这种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统治，成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和政治的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因素，但是封建主义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它已经不是原来的封建社会，但也没有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成了半封建社会。

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② 当时湖南韶山的民谣称：“农民身上三把刀：租重、税多、利息高；农民面前路三条：逃荒、讨米、坐监牢。”据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中的记载，当时广东海丰县农民平均年收入 165 元，其中 81 元交租，自留的 84 元中，40 元用于购买种子、肥料、农具，余下的 44 元不够一个人糊口，根本无法养家。”江西安源民谣称：“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意即讨饭）；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据李大钊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

^① 《毛泽东选集》，第 63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631 页。

活》一文中的记载：唐山一骡，日费5角，工人一日工银仅2角；死一骡资方损失100元，死一工人只需出30—40元。据此，作者愤慨地写道：“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显然，对于被驱赶到饥饿和死亡线上的中国人民来说，除了奋起抗争，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正是基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① 事实上，西方资产阶级在侵略东方的过程中“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② 也正是这些人所进行的革命，最后埋葬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中国的反动统治。

二、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它有着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丰富的物产，悠久的历史。它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明，曾经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中国人民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而且酷爱自由，具有反抗黑暗势力的传统。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民中间产生过许多的民族英雄、革命领袖，产生过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③

中国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们珍惜它的光荣的过去。他们不能容忍外国侵略者对它肆意蹂躏，不能允许它由于贫弱而走向灭亡。如何挽救祖国的危亡，争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如何实现国家的富强？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6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5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23页。

对于 19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来说，在救国这个问题上，惟一可能作出的答案就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①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描写了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怎样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历程，并且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②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并不是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封建阶级中的开明派林则徐就已经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注意了解西方的真实情形了；在林则徐主纂的《四洲志》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的魏源并且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当时他们提倡的学习西方，主要是着眼于科学技术的领域。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把这种向西方的学习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是因为他借用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形式，并从农民革命的需要出发对它进行加工改造之后，创立了拜上帝会，以此组织群众，向封建统治阶级发动了英勇的攻击；也不仅因为他颁布了否定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天朝田亩制度》，而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意味着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而且还因为他明确地支持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洪仁玕认为，英、美、法等“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他说，俄国彼得大帝由于曾“到佛兰西学习邦法，火船技艺”，因而“大兴政教”，“声威日著”，使俄国成了“北方冠冕之邦”。“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师法的。他不仅提出要向西方国家学工艺技术、兴银行、办工业、开矿藏、设新闻官书信馆等，而且主张“准富者请人雇工”，对于穷人“则宜令作工以受其值”，^③ 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政新篇》曾经洪秀全批准后公布，洪秀全并曾在该书上多处写下了“此策是也”、“钦令此策是也”等的批语。

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在西方的直接影响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47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469 页。

^③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